

1840—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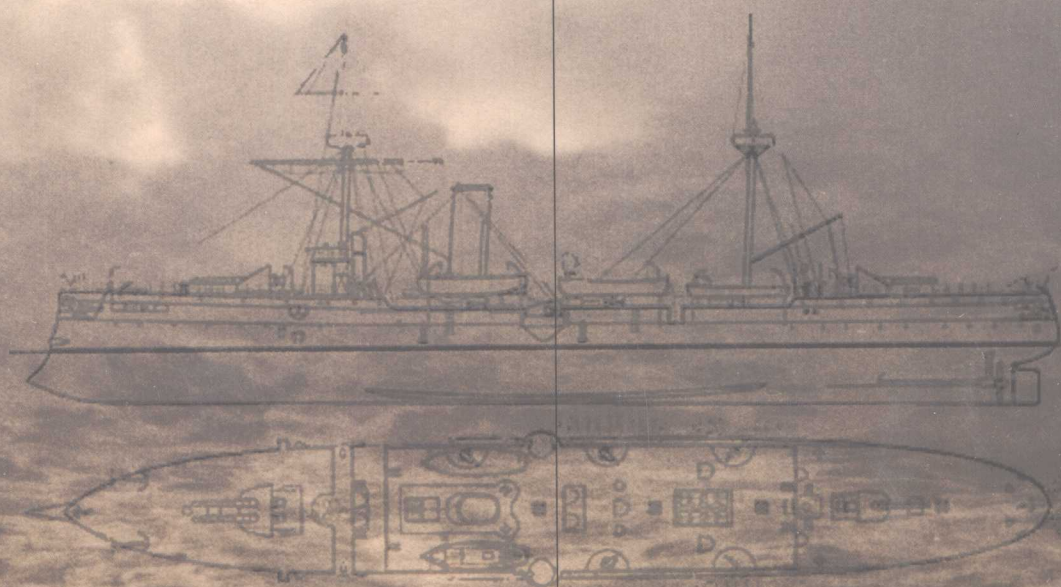
JINDAI
ZHONGGUO
HAIJUN
DASHIBIANNIAN

刘传标 编纂



近代中国海軍 大事编年

上卷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 刘传标 编纂

1840-1949
「近代中国海军
大事编年」上卷

海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海军大事编年. 上册/刘传标编纂.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0597-785-0

I. 近… II. 刘… III. 海军—军事史—大事记—中国—
近代 IV. E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997 号

近代中国海军史大事编年(上卷)

刘传标 编纂

责任编辑: 刘 克

整体设计: 窦胜龙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福建幻灯制片厂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 张: 40.25

字 数: 9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597-785-0/E·1

定 价: (上、中、下) 2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序

中国是一个濒临海洋的文明大国。大陆海岸线北起与朝鲜交界的鸭绿江口,南至与越南交界的北仑河口,长达 18400 万公里。若把全部岛屿的海岸线计算在内,则整个海岸线的长度可达 32000 万公里。海域管辖面积 300 多万平方公里,约占陆地的三分之一。其中除渤海为中国的内海外,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东临浩瀚的太平洋。

中华民族自旧石器时代就与海打交道,靠海补充食物。海洋,哺育着中华民族的丰富智能,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航海活动的国家之一,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之一,还是世界古代海军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 6 世纪,中国舟师就已经诞生,公元前五世纪就把水军应用于江河湖泊和海上作战。据古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诸侯国“吴”就曾派出众多的舟师跨海北上,去攻打北方的另一诸侯国“齐”,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上征战,结果“吴国”被打败。这次水上征战,比罗马和迦太基在地中海进行的第一次布匿战争,要早 200 多年。从奴隶制到封建社会的 2500 多年间,中国古代水军和战船作为一支战略力量,活跃在军事和战争舞台上,开拓疆域,抵御外侮,为中国海军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随着民族灾难的加深,海洋意识与近代海权思想逐渐勃兴,仁人志士为捍卫祖国的海疆进行了不屈不挠抗争,造就了一支近代海上防御力量。

在近代,具有很强的开放、思变意识的海军人士,“不畏强暴、敢于拼搏”、“不空谈、务致用”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品格,代代相传,如海如潮,永不歇息,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加强对近代海军史的研究,挖掘与提炼海洋文化,为经济建设服务,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福建社会科学院刘传标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海军史料和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钦羡的丰硕成果。晚近时期,他根据清代档案和民国档案,以及台湾出版的《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和海军人员的回忆录、传记、电报函稿等资料,前后历时七年编纂的《近代中国海军大事编年》,全书共 200 多万字,收录了 1840 年至 1949 年 100 多年间的海军活动,纵向上阐述了中国晚清、民国时期海军的近代化和建国初期人民海军的组建;横向则以各历史时期的海防背景为依托,将各时期各派系的海军活动,以图文结合的编年形式编纂。通过以海军活动及 5000 余幅历史图片为“经”、以事件背景的注文为“纬”的模式,化繁为简,直观生动地介绍了近代中国海军的产生、演变和征战、人物事迹等,对近代中国海军兴衰嬗变过程的整体面貌作了编年式展示,生动直观、通俗易懂地还原了封尘久远的历史。编者既注重反映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海上侵略所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又展现了鸦片战争后百余年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逐渐重视海防建设,海军由弱趋强的发展过程。可谓是中国海军史研究领域中的

一部规模最为宏大、最具特色的著作。

该书在资料工具的价值方面无疑是一部内容翔实、观点正确、雅俗共赏的爱国主义好教材,是目前国内出版界最全面的有关近代中国海军史图文资料的集结,是近代中国海军史料大全,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它的出版问世,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军事发展史、军事政治制度发展史、中国近代人物的活动等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的海军史研究和历史教学,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该书对宏扬我国灿烂悠久的海洋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树立现代海洋国土观、现代海洋经济观和现代海洋防御观,增强海洋、海权和海防观念,有着重要的现实与借鉴意义。

我与刘传标认识多年,他的博学与勤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在学术上不断有新的追求。相信他多年付出的辛劳,定会有新的收获。在《近代中国海军大事编年》一书面世之际,写下这几句话,是为序。

黄长著

2008年1月9日

黄长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全国社科规划办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规划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翻译系列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曾担任两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曾担任亚太地区社科情报网络地区顾问小组副主席;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评估专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前言

近代中国的海军自诞生之日起四分五裂、派系繁杂,在清季有北洋、南洋海军(水师),在南洋海军(水师)中又有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

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在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海军也从来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在北洋政府时期,既有闽(中央)系海军,包含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吉黑江防舰队及海军学校、造船所等;又有东北(青岛)系海军,包含海防和江防舰队及海军学校、造船所等;又有广东江海防舰队,及闽系海军南下参加护法的护法舰队和海军学校、造船所等。

在南京政府时期,虽然名义上将全国的海军整编为四个舰队,但闽系、粤系、青岛系仍各自保持独立的架构。闽系(中央系)有第一(海防)舰队、第二(江防)舰队、练习舰队、鱼雷游击队、巡防艇队,东北青岛系有名义上的第三舰队(包含海防、江防舰队),广东有名义上的第四舰队(包含海防、江防),同时有蒋介石集团的军政部电雷系鱼雷艇队。

在抗战期间,虽然闽系海军、青岛系海军和粤系海军舰艇虽损失殆尽,但海军各派系架构仍保持。同时随伪满、汪伪政权的建立,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伪海军随之诞生,有伪满政府的江防舰队(后改为江上军)和汪伪政府的海军部和舰队及巡防队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大肆排挤长期以来居主导地位的闽系海军,将闽系海军的首脑人物陈绍宽等以种种名目将其排挤出海军核心领域,海军名义上实现了统一,整编为海防第一、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及运输舰队(后改登陆艇队),但海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仍十分剧烈。

现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档案馆和第二档案馆的资料多为中央(闽)系的档案,其它地方性海军(水师)则因种种原因,分散各地且不完整,给海军史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本书取材于清代档案和民国档案,以及台湾出版的《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和海军人员的回忆录、传记、电报函稿等资料,前后历时七年搜集资料与编纂。

全书 200 余万字,并精心选用多家档案馆、博物馆珍藏及海军界后裔私人珍藏的 5000 余幅历史照片。

本书按不同历史时期,编纂为 4 篇:第一篇《满清政府海军大事编年》,第二篇《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海军大事编年》,第三篇《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海军大事编年》,第四篇《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抗战后海军大事编年》。

目 录

序

前言

中国近代海军概述/001

上卷

第一篇 满清政府海军大事编年(1840—1911)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037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041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043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045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045

咸丰三年癸丑(1853)/046

咸丰四年甲寅(1854)/046

咸丰六年甲寅(1856)/046

咸丰八年戊午(1858)/047

咸丰九年己未(1859)/048

咸丰十年庚申(1860)/049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053

同治元年壬戌(1862)/054

同治二年癸亥(1863)/058

同治三年甲子(1864)/061

同治四年乙丑(1865)/061

同治五年丙寅(1866)/063

同治六年丁卯(1867)/069

同治七年戊辰(1868)/077

同治八年己巳(1869)/085

同治九年庚午(1870)/092

同治十年辛未(1871)/095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097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116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120

光绪元年乙亥(1875)/124
光绪二年丙子(1876)/128
光绪三年丁丑(1877)/134
光绪四年戊寅(1878)/144
光绪五年己卯(1879)/147
光绪六年庚辰(1880)/156
光绪七年辛巳(1881)/168
光绪八年壬午(1882)/184
光绪九年癸未(1883)/195
光绪十年甲申(1884)/202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249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267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290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303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313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320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326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334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336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338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434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477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482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487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498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502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528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531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533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535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539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543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548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554
宣统元年己酉(1909)/565
宣统二年庚戌(1910)/575
宣统三年辛亥(1911)/584



中国近代海军发展概述

清朝末年,承担海防重任的旧式水师已是船坏炮锈,官兵减员,几乎停止海上训练、巡哨。英帝国主义的侵华舰队凭借其坚船利炮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打开了“天朝帝国”的门户。接着在沙俄、美国怂恿和支持的英、法帝国主义又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海上打进中国,先是攻陷天津,旋即打入清王朝的都城——北京。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中国海防空虚,海疆的门户顿开,从此中国人民日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外患未除,内忧又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半壁江山,长江流域的清军旧式水师遭到太平军水师的沉重打击,可供巡防之用的水师船所剩无几。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和占据江南半壁江山的太平军,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之中。

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部分掌握军政大权的官员和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建议设船厂,练海军,加强海防,抵抗侵略。此后的30余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开始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的“自强”、“求富”洋务运动。中国社会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军界洋务派也借用外国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的近代海军,进行了种种尝试和实践。

一、近代化海军的尝试

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认为“要摆脱危机,必须先镇压太平天国”。这一主张得到西方列强的赞许,他们认为清政府与太平军作战不顺利,原因在于舰炮不得力,纷纷提出要以兵船助剿太平军。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和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建议从英国购买小火轮船十余艘,来攻打太平军。赫德甚至为清政府拟定了一份诱人的时间表:如果1861年年底派人订购船只,次年9月,船只就可全部到华,再经过一段时间训练,1863年4月即可投入长江作战,6日之内可抵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一天即可攻破南京城。

急于摆脱危机的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大员受此鼓动纷纷向清廷奏请“从速购买英国炮舰”。咸丰皇帝批准了“花钱买船建舰队”的奏请,并命令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迅速筹款购船。

两广总督劳崇光奉咸丰皇帝之令于1862年2月27日,在广州与赫德进行磋商,决定委托江海关总税务司英籍人员李泰国(Horatio Nelson)到英国购买中号兵轮3艘,小号兵轮4艘。经李泰国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谋划,英国外交部迅速批准了李泰国的请求,并函告海军部,挑选一名海军军官担任中国政府的军事职务。英国枢密院则专门颁发了一项不必经议会同意即可实施的特别法令,正式批准了为中国组建舰队的计划。随后,英国海军部将筹备舰队的任务交给了皇家海军上校诺尔·阿思本(Sherard Osborn)。李泰国、阿思本秉承英国政府的旨意,积极展开活动,很快订购了“北京”、“中国”、“厦门”、“江苏”、“广东”、“天津”、“奉



天”(“穆克德恩”)等8艘舰船,其中7艘军舰,1艘辅助船,总造价80万两白银。阿思本还招募了600名海军官兵及英籍舰长派到各舰任职,组建了“阿思本舰队”,美其名为“中英联合舰队”。

为了“合法”地控制这支舰队乃至整个中国海军,1863年1月16日,李泰国擅自代表中国政府与阿思本在伦敦签订了合同“十三条”。合同规定,由阿思本任舰队的最高指挥官(舰队司令),不仅指挥新购的舰船,而且还可指挥中国原有的西式舰船;舰船人员的选用,概由阿思本和李泰国决定;这支舰队虽然听命于中国皇帝,但皇帝的一切谕旨均须通过李泰国转达,而李泰国拥有传达、解释甚至否定皇帝谕旨之权。

对英国政府的上述活动,清政府一无所知。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为防止这支舰队被外国人控制,曾指示两江总督曾国藩预先做好具体安排。曾国藩受命后,随即确定了各舰的管带,并派巡湖营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统辖整个舰队。

1863年6月,休假期满的李泰国回到中国。他将舰队的组建情况以及与英国政府签订合同“十三条”的情况向清政府作了详细汇报。李泰国的陈述犹如一颗炸弹,在朝廷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大员们纷纷表示,如果这支舰队按照合同“十三条”的规定,不能听命于中国,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清政府当即表示拒绝“十三条”。

李泰国却抓住清政府急于得到这支舰队的心理,极力狡辩,试图让清政府承认现实。清政府则考虑到民族的尊严,始终不予认可。此事僵持了一个月之久。最后,双方均做出让步,达成了一个折中协议,这便是清政府提出的《轮船章程五条》。章程规定,新舰队由中国选派一名武职大员担任“汉总统”(司令),阿思本担任“帮同总统”(副司令),任期4年。舰队的一切事宜由两总统协商办理;舰队作战应听从所在督抚的节制调遣,行兵进止由中国主持。

1863年8月22日清廷颁令将向英国购买的“北京”、“中国”、“厦门”、“广东”、“天津”、“江苏”、“穆克德恩”号等7艘兵船,分别改名为“金台”、“一统”、“广寿”、“百粤”、“三卫”、“镇吴”、“得胜”号,并决定以长江水师武员分统各船。

1863年9月18日,阿思本率领舰队抵达天津。当他进京听说了《轮船章程五条》的内容后,勃然大怒,气势汹汹地叫嚷:“《轮船章程五条》不能算数,否则,将把舰队扣住。”此时,李泰国也出尔反尔,与阿思本一唱一和,要求清政府必须按合同“十三条”办事。清政府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随后,双方进行了多次的激烈争辩,始终没有结果。10月15日,阿思本向总理衙门提出,如果再不同意合同“十三条”,他将在48小时内将舰队解散。

10天后,清廷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重申“中国兵权不可假与外人”,宣布中国不能批准合同“十三条”,决定遣散舰队,全部舰船由英国负责变价出售,然后将所得款项交还中国。同时还表示,愿意承担阿思本的劳务费以及600名英国官兵9个月的薪水和回国路费共计白银38.2万两。3天后,清政府免去李泰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由赫德接任。

清政府企图依赖购买外国军舰来巩固自己的海防和建立中国近代化海军,宣告失败。

二、中国近代化海军的诞生

“阿思本舰队”事件暴露了西方列强企图控制中国的野心,促使部分掌握军政大权的官员进一步认识到,建设中国近代海军,必须兴办自己的造船工业,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聘用洋员时,必须始终不忘“权操自我”。

此后,洋务派开始从妄想通过由外国人帮助建立起近代化海军转向自购自建海军。

1865年5月23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上疏奏请在江苏设立制造局,以苏淞太道丁日昌为制造局总办,制造枪炮军火等。6月3日李鸿章、丁日昌购买美国人佛而士开设在上海虹口地区的旗记铁厂(Thos Hunt & Co.),并将原有的丁日昌局、韩殿甲局(两个均为洋炮局)并入,及容闳从美国朴得南公司(Put-

nam Machine Co.)买回的100余台机器,组成“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以“制造船炮军火、各种机器”。
 1866年6月25日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局,购机器觅洋匠试造轮船。7月14日清廷准闽浙总督左宗棠兴建船政的奏议,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在闽择地设厂试造轮船。8月1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也奏请朝廷在天津设立机器局。
 1867年1月6日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以培养与训练精通法国的造船技术和英国的驶船技术的人才。
 同年,广东巡抚蒋益沣与两广总督瑞麟会商后决定向英、法购买西式军舰6艘,取名“安澜”、“镇涛”、“澄清”、“绥靖”、“飞龙”、“镇海”。

随着江南制造局试造的蒸汽兵船“恬吉”号炮船下水和福建船政局开工试造的近代蒸汽船及广东等省向英法订购的兵船先后到华,给濒于衰败的水师带来了生机,也为创建近代化海军奠定了基础。
 1868年12月31日,湖广总督李鸿章向清廷提议创建轮船水师,设立北洋、中洋、南洋水师。设北洋提督,驻扎大沽,以巡防于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以巡防于江苏、浙江各海口;南洋提督,驻扎厦门,以巡防于福建(包含台湾)、广东各海口。
 福建近代化海军的建设
 福建船政局到同治九年(1870),已造出“万年清”、“湄云”、“福星”三艘兵轮,给濒于衰败的福建水师带来了生机。1870年9月2日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请简派轮船统领。9月18日清廷下谕正式成立新水师,委派李成谋为福建水师提督,责成其将船政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之需”。1871年2月福建船政后学堂第一届驾驶班学生刘步蟾等10人,堂课结束,按“成一船练一船之兵,配一船之官”的主旨,派“建威”练船练习。福建凭借船政局建造的兵船数量增长和船政学堂培养的新型海军军官的相继毕业,中国近代化海军首先在福建诞生了。

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福建船政“万年清”、“伏波”等15艘投入福建水师服役。同治十三年五月(1874年6月),福建水师开始参照欧洲舰船编制,按大、中、小型兵轮配备官兵员额,大型兵轮180名,中型兵轮98名,小型兵轮67名,编组水面部队。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五日(1875年5月30日)清廷决定筹办南北两洋海防,沈葆楨以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兼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福建虽隶属南洋,但福建水师建设并未按计划纳入南洋系列,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独立发展。不过,福建船政兵船仍经常被外省拨用,加之福建船政经费支绌,此后的造船速度已大为放慢,因此福建的水师实力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加强。到光绪十年五月(1884年6月),福建船政兵船留防本省者仅8艘,分防各省者则达到14艘。
 到中法马江海战前夕,福建水师共拥有福建船政建造的“扬武”、“琛航”、“永保”、“伏波”、“济安”、“飞龙”、“振威”、“福星”、“艺新”等9艘兵船,及购自英国的“福胜”、“建胜”2艘炮艇,计11艘,排水量9000多吨,舰员1100多人。驻福州、厦门,守卫海口,巡守台湾及琼廉海面。
 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1874年8月23日)中法马江一战,福建水师轮船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一蹶不振。至辛亥革命前夕,福建仅有运输舰3艘、巡缉兵船3艘,总吨位3875吨。

2、粤洋水师的建设

广东位于中国南疆海防前哨,是近代中国最先购置西方军舰的省份。自强运动兴起后,广东为增强防御实力,除添置旧式炮船外,还设法购造新式兵船。同治六年、七年(1867年、1868年),广东先后向英国购买“飞龙”、“安澜”、“镇涛”等兵船,向法国购买“镇海”、“澄清”、“绥靖”、“恬波”等兵船。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十日(1872年6月15日),又从福建船政调拨“安澜”号(与前购英舰同名)。此外,广东还设制造局先后建成内河小轮船16艘,派拨东、西、北三江巡缉。到同治末年,广东购制新式兵船已达24艘。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五日(1875年5月30日)清廷确定同时筹办南北两洋海防,沈葆楨以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兼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但是,广东历任督抚仍旧坚持独立发展海军。刘坤一于光绪元年(1875年)出任两广总督后,续造出“海长清”、“执中”、“镇东”、“缉西”等4艘小兵船及“海东雄”木壳炮艇。光绪七年六月三十日(1881年7月25日)向英国订购的炮艇“海镜清”也驶抵广东。光绪八年自德国购回“雷龙”、“雷虎”、“雷中”3艘鱼雷艇,光绪十年后又从德国购回“雷龙”、“雷虎”、“雷中”、“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艮”、“雷巽”、“雷兑”等11艘鱼雷艇。张树声、曾国荃任两广总督期间,又先后为广东水师建造了“靖安”、“横海”、“宣威”、“扬武”、“翔云”、“肇安”、“南图”等兵船。到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时,广东共有中小兵船25艘。

虽然中小兵船25艘,数量居全国首位,但实力却是最弱的,仅能供缉捕、转运之用,不堪出海作战。在张之洞任职五年余期间,他采取自筹资金的办法来更新广东水师装备。光绪十一年初,张之洞令广东水师提督方耀为督办,臬司沈檀经、候补道施在钰为会办,利用原广东军装机器局船坞,开设黄浦船局,试造“广元”、“广亨”、“广利”、“广贞”等4艘铁肋木壳炮艇。光绪十二年七月(1886年8月)间,张之洞又集资80万两,在黄埔船厂建造“广亨”、“广利”浅水炮舰2艘,并委托福建船政建造1000吨以上“广甲”、“广乙”、“广丙”、“广丁”4艘。为了提高广东水师的实战能力,自光绪十七年(1891年),广东水师将能胜任外海作战的主力战舰“广甲”等派赴北洋参加海军操演,以提高驾驶水平和作战能力。

光绪二十年四月(1894年5月),清廷第二次校阅水师,广东水师记名总兵余雄飞带“广甲”、“广乙”、“广丙”3舰往北洋会操。会操结束后,因朝鲜局势渐趋紧张,“广甲”、“广乙”、“广丙”因而留北洋,编入北洋水师,并随北洋舰队参加甲午海战,均先后损失。

甲午海战后,广东水师尚有数百吨炮舰20余艘、“雷”字号小鱼雷艇11艘,但多已老朽不堪,仅能供巡缉之用。

3、南洋水师的建设

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五日(1875年5月30日)清廷决定筹办南北两洋海防。沈葆楨以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兼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谓“南洋”,几乎包含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的所有省份,主要是指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但福建、广东两省早已在同治年间,都建立了近代海军舰队,形成了分办南洋海防的局面。所以,南洋大臣名义上统辖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外海水师轮船,实际上始终无力问及闽、粤。后来的所谓“南洋水师”仅是江苏地区(最多及于钱塘江口)水师的称谓。

南洋海军建设虽然起步较早,但其发展却很缓慢。光绪元年(1875年)以前,南洋海军因借江南制造总局之便,已经拥有该局制造的“测海”、“威靖”等数艘兵船。沈葆楨受命督办南洋海防后,先后通过调用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舰船,来充实南洋的海防力量。光绪元年至四年,又先后调拨江南制造局新制成的“驭远”、“金瓯”2船和福建船政建造的“靖远”兵船至江南遣用。光绪五年十月(1879年11月)沈葆楨请李鸿章代购“镇北”、“镇南”、“镇东”、“镇西”4艘英国炮艇,驶抵天津大沽后被李鸿章留在北洋,李鸿章把已在北洋使用数年的“龙骧”、“虎威”、“飞霆”、“策电”4艘炮艇送往上海修理后划归南洋抵数。南洋水师自此成军。

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四日(1879年12月26日),沈葆楨卒于任上,继沈葆楨之后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其任内,调用福建船政局新建造的“澄庆”兵船赴江宁驻防。

在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期间,左宗棠曾向福建船政局订造5艘巡洋舰,其中第一艘“开济”号于光绪九年八月(1883年9月)建成试洋,11个月该轮开赴南洋,交由南洋大臣验收遣用。这是南洋拥有的第一艘巡洋舰。光绪十年(1884年)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又向德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南琛”、“南瑞”号,实力有所



增强。到中法战争前夕,南洋水师共有舰艇 14 艘。

南洋水师因兵船少,未定编制,也未设有专管提督。光绪十二年(1886 年)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调南洋兵轮参加合操,南洋派记名总兵吴安康统带“南琛”、“南瑞”、“开济”3 艘快船参加会操。此后每年春分过后,南洋兵船中能应用于海战的“南琛”、“南瑞”、“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都由海军衙门调归北洋合操,暂归北洋提督节制。秋分节气以后,南洋兵船才驶回。光绪十六年四月(1890 年 5 月),曾国荃正式奏请任命轮船营务处提督衔吴安康为“南琛”、“南瑞”、“开济”、“镜清”、“寰泰”、“保民”6 船统领。为统一事权,于同年七月又奏请派布政使衔前山西按察使陈湜为南洋水师暂行总统。光绪十七年(1891 年)四月,署两江总督沈秉成奏请,以记名提督前安徽寿春镇总兵郭宝昌接任南洋兵轮船总统,裁撤原统领名目。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后,参照北洋水师章程,厘定南洋军制,经奏准,将南洋可供海战的“南琛”、“南瑞”、“开济”、“镜清”、“寰泰”、“保民”6 船分为左右翼,各设翼长 1 人。袁九皋任左翼翼长,统带“南琛”、“镜清”、“保民”3 舰,并兼带“南琛”;吴安康任右翼翼长,统带“寰泰”、“开济”、“南瑞”3 舰,并兼带“寰泰”。

南洋水师在中法战争前拥有舰艇“南琛”、“南瑞”、“澄庆”、“驭远”、“横海”、“开济”、“镜清”、“威靖”、“测海”、“登瀛州”、“超武”、“靖远”、“龙骧”、“虎威”、“飞霆”、“策电”、“金瓯”等 17 艘,其中“澄庆”、“驭远”于光绪十一年在浙江石浦港被法国军舰击沉;“横海”于光绪十二年在澎湖遇雾触礁沉没。随即“超武”号也调归福建。到光绪十七年六月(1891 年 7 月),南洋水师仅拥有“寰泰”、“镜清”、“开济”、“保民”、“南琛”、“南瑞”、“威靖”、“测海”、“登瀛州”等 13 艘。

从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一年(1885—1895 年)的 10 年间,南洋水师只增添钢板船“保民”、“寰泰”等 2 艘。至甲午战争前,南洋仅有舰艇 15 艘,1.9 万吨。南洋海军虽然没有在甲午战争中受到损失,但仅有舰艇 15 艘,且多已老化。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冬,南洋水师向德国订购的“辰”、“宿”、“列”、“张”4 艘鱼雷艇驶回中国后,南洋水师的实力略有增强。

4. 北洋水师的建设

所谓的“北洋”是指直隶、山东、奉天三省。在光绪元年(1875 年)以前,北洋三省曾分别拨调福建船政局的轮船以加强海口防御。其中,暂署盛京将军瑞联于同治十一年六月(1872 年 7 月)奏准调用福建船政局建造的“湄云”兵船赴奉天牛庄海口巡缉;同月,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调“飞云”兵船赴山东遣用;八月(9 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又调拨的“镇海”兵船到天津。此外,李鸿章还于同治十年(1871 年)夏从江南制造总局调拨“操江”兵船到天津,供北洋巡哨之用。

1875 年 4 月 27 日(光绪元年),北洋大臣的李鸿章通过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向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船厂定购“龙骧”、“虎威”、“飞霆”、“策电”4 艘“蚊子船”用于守口,开始了北洋水师的建设。光绪四年(1878 年)以后,李鸿章开始为北洋水师购买巡洋舰和铁甲舰,加快了北洋海军的建设步伐。

光绪五年十月(1879 年 11 月),李鸿章将南洋定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4 艘炮艇留归北洋使用,而将“龙骧”、“虎威”、“飞霆”、“策电”4 艘炮艇划抵南洋。北洋水师雏形渐逐成,并于光绪六年(1880 年)夏,聘任英国人葛雷森为总教习,协助丁汝昌督练炮船。

光绪六年七月十四日(1880 年 8 月 19 日),李鸿章奏请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培养自己的海军人才。光绪七年九月(1881 年 11 月),李鸿章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定购的“超勇”、“扬威”2 艘巡洋舰驶抵大沽。同年十一月(12 月)委任丁汝昌为北洋水师统领。

光绪六年(1880 年)底和光绪七年(1881 年)夏,李鸿章又通过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在德国伏耳铿船厂先后定购了“定远”、“镇远”2 艘铁甲舰。光绪九年二月(1883 年 3 月),李鸿章又向德国伏耳铿船厂定购新式穹面钢甲快船“济远”号。

自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后的近10年间,北洋先后在英、德两国订购11艘舰船(包括李鸿章为山东购买的“镇中”、“镇边”2艘炮艇,后来也划入北洋海军序列)及4艘单管鱼雷艇。同时从福建船政局调来“威远”、“康济”两船充作练习舰,到1884年,不计尚未交货的“定远”、“镇远”、“济远”3舰,北洋已拥有舰艇14艘(不含鱼雷艇),初具舰队规模,实力大增。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1888年12月17日)北洋舰队正式组建成军。

北洋海军的编制分为船制和官制两个方面。船制分为战船、守船、练船、运船。列编舰艇25艘,官兵4000余名。

北洋舰队成军之初的编制:全军分为中军、左翼、右翼和后军4队。中军为“致远”、“济远”、“靖远”3舰,左翼为“镇远”、“经远”、“超勇”3舰;右翼为“定远”、“来远”、“扬威”3舰。以上9舰均为战舰。后军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6艘炮艇,鱼雷艇6艘,练习舰3艘,运输舰1艘。

北洋舰队的官制,是参酌英、德两国海军官制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制定的。设北洋海军提督1员,统领全军。归北洋大臣节制。在威海卫建造衙署。设总兵2员,分左、右翼,各带铁甲战舰为领队翼长。设副将5员,分任“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5舰管带。副将以下各官员,根据他们所带舰艇的大小、职事的轻重,按品级分别安排。设参将4员:提标中军参将1员,负责全军粮饷事宜;提标管轮参将1员,考查全军轮机事务;左翼右营参将1员,管带“超勇”舰;右翼右营参将1员,管带“扬威”舰。后军各舰,均以游击、都司任管带,其中游击9员,都司27员。鱼雷艇多以守备管带,守备设60员。设千总65员,把总99员,经制外委43员。

光绪二十年四月三十日(1894年6月30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大东沟海面爆发海战,北洋舰队损失了5艘军舰。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驶返旅顺口军港修整。10月下旬,日本陆军兵分两路侵略中国:一路由朝鲜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节节朝纵深方向推进;另一路在辽东半岛海岸中部的花园口登陆,迅速向辽南方向进攻。迫使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移驻到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军港。11月下旬,日军攻占号称“亚洲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军港及辽东半岛,于12月中旬发起旨在歼灭北洋舰队的山东半岛战役。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迅速兵分两路向西推进,达成了对威海卫军港海陆夹击的战役态势。自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底(1895年1月下旬)起,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官兵,在威海卫军港内与海陆方向的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七日(1895年2月11日)晚丁汝昌在坚守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在提督衙门服下鸦片膏自杀身亡。接着,署理“镇远”管带杨用霖、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也相继自杀。丁汝昌死后,洋员马格禄、浩威、瑞乃尔及部分清军官员商议向日军投降。正月二十日(2月14日)下午,在“松岛”舰上签定的《威海降约》(共十一款)。北洋水师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总排水量15375吨),官兵共计5124人(其中陆军2040人,海军3084人)向日军投降。被卸去舰炮的“康济”练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杨用霖、戴宗骞等人的灵柩及海陆官兵凄然离开已经陷落的威海卫港。这支苦心经营15年的清朝海军主力——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3月12日)清廷下令撤销海军衙门。四月初四日(4月28日)又下令将北洋水师幸存的将领革职查办,自提督、总兵至千总、把总、外委,总计315员名一律裁差。北洋海军的编制被正式取消。

5、清廷统一海防建设的尝试

光绪五年(1879年)清廷对统一海防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九年(1883年)在都察院署左副都御史张



佩伦的建议下,清廷在总理衙门内添设了一个“海防股”。“海防股”除了“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外,“凡长江水师、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轮船、枪炮、药弹,创造机器,铁路及各省矿务皆隶属焉”。

海防股设立后,要求设置海军衙门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中法战争结束不久,清廷发动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成立海军衙门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统一海防的大计终于开始实现。光绪十一年九月十七日(1885年10月24日)海军衙门正式办公,标志着我国近代海防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海军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军种。

海军衙门的组织大体是依照清代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传统体制,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一是管理部门,由朝廷任命的5位大臣组成,一是秘书部门,由各种“章京”及“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组成。前者负责政策制定,后者辅佐前者办理一般性的例行公务及庶务。海军衙门大臣除王大臣外,始终由地方督抚兼任。编制上“总理海军事务大臣”(简称“总理海军大臣”)1人,“会同办理海军事务大臣”(简称“会办大臣”)2人,“帮同办理海军事务大臣”(简称“帮办大臣”)2人。下设机构为“股”,设有“管理海疆股章京”、“管理款项股章京”、“管理船政股章京”、“管理军械股章京”、“主稿章京”等3至4人。及“轮班当月章京”5至6人和“印务参领”2人。

海军衙门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的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被裁撤。

6、甲午战后南北洋海军的建设

(1)甲午战后北洋海军的建设

甲午战争结束时,中国仍有大小舰艇60余艘。数量固然可观,但质量却极差。尤其是北洋水师仅存“康济”练习舰1艘。光绪二十一年八月(1895年9月)向福建船政局调用刚建成的“建靖”轮到北洋,改为练习舰,更名“通济”;将福建船政局建造、原被奉天调用的“湄云”炮船收归北洋,改为运兵船。同时向英国订购的“飞霆”、“飞鹰”猎舰(即驱逐舰)抵达天津大沽。此时北洋水师只有5艘舰船。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间,中国收回大连湾和旅顺港后,清廷又令两江总督张之洞调派南洋水师数艘兵舰北上,驻扎于旅顺船坞。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南洋的“开济”、“寰泰”2舰驶抵旅顺,另有南洋的“镜清”、“南瑞”和福建水师的“福清”等3舰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896年1月8日)陆续驶抵旅顺。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1898年7月27日)和七月初八日(8月24日)中国向德国伏耳铿厂订购的3艘穹甲巡洋舰中的“海容”、“海筹”先后驶抵天津大沽,最后一艘“海琛”号也于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到达天津大沽。

“海容”、“海筹”、“海琛”等3舰到华后,“海天”、“海圻”2艘巡洋舰也即将到华。北洋急需有经验的军官充任统领和管驾,而当时合适的人选只有那些在甲午战后被革职的海军将领。为此,北洋大臣向清廷奏请,重新起用在甲午战后被革职的海军将领,首先被撤销革职处分的是叶祖珪和萨镇冰。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1899年4月17日),清廷下令派提督衔补用总兵叶祖珪为统领,总兵衔补用参将萨镇冰为帮统领。并令该统领等“选择朴实勇敢、熟悉驾驶之员,督同认真操练,以为整顿海军始基。”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1896年11月)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的2艘巡洋舰“海天”、“海圻”号到华交货,清廷即以刘冠雄为“海天”管带,以萨镇冰兼“海圻”管带。此外向德国实硕厂订造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4艘鱼雷艇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华。光绪二十八、二十九年(1902、1903年),又经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保,清廷又将原北洋海军军官林颖启、李鼎新、李和、蓝建枢、何品璋、程璧光、林文彬等先后开复原官,充任北洋海军舰艇的管带等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分别实授叶祖珪为浙江温州镇总兵、萨镇冰为广东南澳镇总兵。经袁世凯

奏准暂缓赴任,仍留北洋海军统带各船。光绪三十年六月十日(1904年7月22日),清廷擢授叶祖珪为广东水师提督,又经袁世凯奏准仍留北洋差遣。

重建后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并再次成为中国当时实力最强的舰队。

(2) 甲午战后南洋海军的建设

南洋水师虽然没有在甲午战争中受到损失,但仅有舰艇15艘,且多已老化。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南洋在德国订造的“辰”、“宿”、“列”、“张”4艘鱼雷艇抵华。但是南洋水师因绌于经费,无力添置新舰,原有兵船日益陈旧。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903年1月11日),刚到任两个月的署理两江总督事务的张之洞奏请除保留“寰泰”、“镜清”2兵轮、“威靖”、“登瀛洲”2运船外,其余“南琛”、“南瑞”、“保民”、“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等7艘舰艇及备差小轮一律裁停。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燾到任后,以南洋节存之款先后向日本川崎船厂订购“江元”、“江亨”、“江利”、“江贞”4艘浅水炮舰。同时,又将张之洞时停役的“南琛”、“南瑞”、“保民”、“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等7艘舰艇先后重修启用。但是,兵轮“寰泰”、蚊船“飞霆”接连失事,新舰又尚未造成,仍然不足以编队。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1905年1月18日),刚接任两江总督不久的周馥与北洋大臣袁世凯会商后,上奏清廷请求将南洋各兵舰归并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统领,“凡选派驾驶、管轮各官,修复练船,操练学生、水勇,皆归其一手调度。南北洋兵舰官弁,均准互相调用。即南洋水师学堂、上海船坞、兵舰饷械支应一切事宜,有与海军相关者,并准该提督考核,会商各局总办道员,切实整顿”。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又先后向日本川崎船厂订购了“湖鹏”、“湖鹗”、“湖鹰”、“湖隼”4艘鱼雷艇和“楚泰”、“楚同”、“楚豫”、“楚有”、“楚观”、“楚谦”6艘浅水炮舰。这批舰艇先后于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07、1908年)到华,南洋海军的实力略有增强。

(3) 甲午战争后闽、粤海军建设

重建海军除了按南北洋分别进行外,闽、粤、湘也同时进行,但发展较为缓慢。

福建水师自中法战争后,迄未恢复元气,仅有“琛航”、“元凯”、“超武”、“靖海”、“伏波”、“飞捷”、“艺新”、“长胜”及新造的“福靖”号共9艘舰艇,实力最为弱小。

广东水师的主力舰艇“广甲”、“广乙”、“广丙”3艘巡洋舰因在甲午海战中损失,虽仍有数百吨炮舰20余艘、“雷”字号小鱼雷艇11艘,但多已老朽不堪,也仅能供巡缉之用。

(4) 甲午战争后海军衙门的建设

甲午战后10余年间,中国南北洋向英、德、日三个国家订购了29艘舰艇,为重振海军奠定了一定的实力基础。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1905年1月18日),两江总督周馥奏请将南洋各兵舰归并现统北洋海军的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统领。周馥的这一主张得到清廷批准后,叶祖珪即在上海高昌庙江南制造总局设海军临时办事机关,负责统领南北洋海军。四月十三日(5月16日)因叶祖珪病休,清廷谕以萨镇冰为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海军,而以李準署理广东水师提督。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一日(1905年8月11日)南北海军合并后改称南北洋海军统制部。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907年6月7日),清廷下令在陆军部内设海军处,处内设六司以理庶政。海军处设正使、副使各1人,承发官2人,录事4人,下设“机要司”(内分制度、器械、驾驶、轮机等4个科)、“运筹司”(内分谋略、教务、测海等3个科)、“船政司”(不设科),原拟之储备、医务、法务等3个司暂缓设置。次年,将“机要司”改称“海政司”,“运筹司”改称“筹备司”,并将原拟之“储蓄司”(分设会计、服用、屯积等3个科)、“医务司”(不设科)、“法务司”(不设科)补设,又增设“主计处”。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9年7月15日)清廷委任郡王銜贝勒载洵和海军提督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筹办海军事务处内设“参赞厅”,参赞厅内分“秘书”、“庶务”两司,置一、二、三等



参谋官,同时设立“第一司”、“第二司”、“第三司”、“第四司”等4个司(后又增设“医务司”等四司)。

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三日(1910年12月4日),筹办海军处改为海军部,载洵为海军大臣,谭学衡为副大臣。

(6)南北洋海军统一后的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成立
筹办海军事务处成立后,清廷于宣统元年六月(1909年8月)下令对南北洋舰艇进行整编,将适于海战的“海圻”、“海筹”、“海琛”、“海容”、“通济”、“飞鹰”、“保民”、“湖鹏”、“湖隼”、“湖鹗”、“湖鹰”、“辰”、“宿”、“列”、“张”等15艘舰艇编为“巡洋舰队”,配备官兵2097人,以程璧光任统领;将适于江防的“镜清”、“南琛”、“建安”、“建威”、“江元”、“江亨”、“江利”、“江贞”、“楚有”、“楚泰”、“楚同”、“楚观”、“楚谦”、“楚豫”、“策电”、“甘泉”、“登瀛洲”等17艘舰艇编为“长江舰队”,配备官兵1542人,以沈寿堃任统领。

同时,陆军部又将长江水师、江南水师、广东水师、福建水师、浙江水师及修造旧式师船的金陵船厂、汉口船厂、汉阳船厂划归“筹办海军事务处”管理。宣统元年九月初三日(1909年10月16日)“巡洋、长江舰队统制部”成立,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910年12月3日)改为筹备海军司令处。
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四日(1910年12月5日),清廷委命萨镇冰为巡洋、长江舰队统制。设巡洋、长江舰队统制处于上海高昌庙。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武昌起义点燃的革命烈火迅速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湖南、江西、云南、浙江、贵州、广西、安徽、福建等省以及上海、苏州、镇江、重庆、广州等城先后响应革命,宣布独立。其他尚未独立各省,也如同一座座火山,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海军同情并响应革命,九月十二日(11月2日)晨,首先是驻守上海吴淞口的“策电”舰大副林舜藩以餐桌白布罩代替义旗,升上“策电”舰旗杆,正式宣告易帜。随后,驻泊在江南制造总局附近江面的“建安”、“南琛”、“飞鲸”、“登瀛洲”、“湖鹏”、“辰”、“宿”、“列”等舰艇卸下龙旗,宣告驻沪海军全部反正。

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黎明,驻泊于江苏南京下关、以“镜清”舰管带宋文翊为舰队长的“镜清”、“保民”、“联鲸”、“建威”、“江元”、“江亨”、“楚观”、“楚同”、“楚泰”、“楚谦”、“通济”、“飞鹰”、“张”字等13艘舰艇也降下龙旗宣告反正。
奉命赴武昌协助镇压起义的“海筹”、“海容”、“海琛”等主力舰艇,在驻沪、宁海军先后宣告起义后,也倾向革命。舰队统领萨镇冰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以“身体有病必须赴沪就医”为由离舰出走,萨镇冰离舰后,“江贞”、“江利”、“楚豫”、“湖隼”、“湖鹗”、“湖鹰”诸舰艇管带召开会议,决定“各行所愿”。于是,“楚豫”、“江利”等舰驶往上海,“江贞”、“湖隼”、“湖鹗”则前往九江,与“海筹”、“海容”、“海琛”会合。“海筹”、“海容”、“海琛”3艘巡洋舰驶离武汉阳逻锚地后不久,“海琛”舰见习士官阳明即扯下龙旗掷于江中,首先悬起白旗,其余两舰也换上白旗。

武昌起义爆发后仅1个月,整个满清王朝的海军即完全倒向革命,均立即调转炮口,协助革命军攻打清军,“海筹”、“海容”、“海琛”、“江贞”、“湖鹗”、“湖隼”等舰艇,在九江决定分成两队:“海筹”、“江贞”、“湖隼”组成第一舰队,以“海筹”舰管带黄钟瑛为司令,随李烈钧开赴安徽;“海容”、“海琛”、“湖鹗”组成第二舰队,以汤芑铭为司令,回援武汉。九月二十八日(11月18日),第一、二舰队同时自九江启航,分别驶往安庆、武汉。承担封锁江面切断清军补给线,并配合革命军防守、向清军发起炮击。

海军全部起义后,于十月十六日(12月6日)在上海召开各处海军代表会议,商讨组建海军统一机关及人事安排。海军各处代表,公举程璧光为总司令,黄钟瑛为副总书记,黄裳治为参谋长,毛仲方为参谋次长。并决定在总司令与副总书记未到任之前,暂由参谋长代理一切,司令部设在上海高昌庙。

三、辛亥革命后海军舰队建设

1、闽(中央)系海军